

六十年代的一次下放劳动

苏维斌

自 1958 年开始，各行各业“放卫星”全面实行“大跃进”，迅速把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推向高潮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搞一平二调、高指标、高征购、干部特殊化等。当时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，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，损失巨大。那时党群干群关系也比较紧张，社会秩序不够稳定。但可喜的是，在 1960 年的下半年，为改善党群、干群关系，保护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，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的生活，施行干部下放劳动的政策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市委决定下放大批干部到基层任实职，协助当地领导解决问题。

1960 年 8 月初，根据市委统一部署，中共房山县委抽调县直机关 360 多人下放到大公社（全县共 7 个），下设的管理区和重点生产大队任副职，凡是这次抽调的委、办、局领导干部都担任管理区的党政副职，科级以下干部担任生产大队的党政副职，下放时间为 1 年零 3 个月，第二年收秋、种麦结束后返回原单位。这次下放干部的任务县委明确规定有三条：一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做到与社员实行三同（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），参与管理区及生产大队的直接领导，组织好农业生产与社员的生活。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，帮助基层领导干部提高管理水平，改善工作作风。三是加强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。县委对这次下放干部工作非常重视，决心很大，下放人数之多，时间之长，是从未有过的。当时，我在中共房山县委组织部任干事，被下放到马安公社，十渡生产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，住在隗功绵家，吃在农民食堂，坚持与社员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虽然，生活比较艰苦，条件比较差，但对我这个三门干部（出家门、进校门出校门、进机关门）来说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我下定决心，通过这次劳动一定要把缺的课补上，一定要把这次下放劳动当成锻炼我的一个大熔炉，不怕吃苦迎接困难，敢于承担责任，决心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，我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。

一、提高领导班子的管理水平。公社领导给我做了简要介绍，此大队约 350 户，共 1300 多人。这个大队比较大，各方面情况比较好，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比较高，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在各项工作中都能走在前面。有位老劳模郑玉仙同志在各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，她是个小脚老太太，虽然不是领导班子成员，但她的思想新，别人不爱管的事儿她主动去管，社员闹了矛盾她主动去调解，经常带头把一条街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起着模范带头作用，还曾到房山县城参加过演出。她的威信很高，大家从心眼里佩服她，是我学习的好榜样，我遇到问题经常向她请教，有了这样一位好同志，对我开

展工作也更加有利。

党支部班子共由 5 人组成，党支部书记祁凤五，我任党支部副书记，支委祁凤堂（大队长），隗有勤、晋国润。他们几个人年龄都比我大，工作经验比我丰富，能力比我强，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，对党忠诚，工作积极，认真负责，在群众中威信较高，不足之处就是文化水平较低，个别同志工作方法简单，群众有些意见，我想怎么解决呢？主要还是要加强学习，提高认识，除经常组织领导班子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重点学习毛主席的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及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等，结合实际进行讨论，这样对支部班子有很大启发，认识上有很大提高，都一致认为：在今后的工作中都必须注意工作方法，工作方法不当，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。对个别工作方法简单的同志，我多次耐心帮助，指出它的危害性，使他认识到今后一定要加以改正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
二、关心群众生活，办好农民食堂。办好农民食堂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，这个大队多是山地，在正常的年景下产的粮食基本够吃。但由于瞎指挥，大刮共产风，加上连年自然灾害，造成大量减产，光靠国家给的定量是吃不饱的，必须想其他的办法。我与食堂管理人员共同研究，他们提出上山采集山桃叶，弄回先用开水焯，再用清水泡得不苦了，放在粥锅里，使粥变稠，我曾经几次上山和社员采集山桃叶。还有，这个大队盛产大柿子，把柿皮削去剁烂，掺在玉米面合起蒸窝头，也能解决部分粮食不足问题。通过这两项办法使食堂的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，社员也比较满意。

三、学习摘花椒的技能。这个大队花椒树比较多，每年一到处暑节就开始摘，一个月左右才能摘完。此活儿看起来简单，实际做起来不易。我见社员摘得又快又干净，而我从没干过，不仅摘得慢，还经常挨扎，挨扎多了手就肿了，总感觉胀痛胀痛的，回去后用热水洗洗才好些。后来就虚心向社员学习，他们也热心教我，并仔细观察他们是怎么摘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有了进步，也掌握了一定技能，比以前摘得快多了，挨扎也少了，我一天也能摘十多斤。

四、关心群众。1960 年 11 月份有一天，社员刘占顺去挖煤土时，外层土坎突然塌了，把他的腰部以下全部埋在土里，上身及头部还在土洞里钻着，听到有人喊：“快救人啊！刘占顺被埋在土里啦！”我正在食堂吃饭，刚喝两口菜粥，感到事态非常紧急，放下碗筷立即跑到出事地点，我也是忙中出错，忘了带工具，到那一看，洞口还没被土封死，还有空隙，我大声问：“占顺怎么样？”他有气无力的说：“快挖我腰这儿。”我就用手挖，正挖时他爱人也赶到了，以为是死了，坐在地上就大哭。我说：“别哭了！还活着！快挖！”她也不哭了，起来赶紧挖。我说：“光咱俩挖也不行啊，我快去叫人。”立即跑回村，就大喊：“快救人啊！要带上铁锹和镐。”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人，很快将他挖出。经检查伤势不是太重，养了几天就好了。事后想起真有点后怕，从此，我俩结上了深厚的友谊，几十年没断联系，现在他的子女还来看我。

五、密切联系群众。由于我是从县委组织部下放的，加上我们的部长隗永

树也是十渡人，去后干部社员对我很关心，也很尊重。我虚心向他们学习，没人拿我当外人，就如同到了家的感觉，年轻人都叫我老苏，实际我才二十多岁。年长者把我当成孩子，比较随便，整天和他们一起学习、劳动，说说笑笑，唱唱跳跳，很开心，这正是我开展工作最为有力的条件。房东大婶儿很关心我，经常给我烧水喝，我也融入了这个家庭，扫院子、担水，每月半斤粮票定量的点心都舍不得吃，给房东的两个小孩儿吃，临走时还把水缸担满了水，对大婶儿说：“您照顾得我很好，很感谢，有什么意见请给我提提。”她说：“你在这儿干的不错，有机会一定到家来。”我说：“肯定要来看您的。”1987年，我们单位在十渡办班，住在山光旅社，过去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听说我去了，一天晚上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十渡喝酒，我想起房东大叔隗合春和祁凤堂，我说一定要把他二人找到，结果没找到祁凤堂找到了隗合春了，我们一起吃饭、喝酒、聊天，他非常高兴。我临回来时民兵连长隗合禄还请我吃了顿饺子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的招待了。

1960年11月底，因工作需要，提前把我调回，接到调令后，我立即做了些准备，向支部说明原因，并将工作交代了一下。我与支部书记说：“明天我该走了，今晚咱们开个简单的会，我向大家告别一下，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。”后来，我发现他们有些动作，我提醒道，你们什么也别弄，千万要注意影响。当时，生产大队确实什么也没有，到晚上开会时，不知他们从哪儿找了一挂羊杂碎和两瓶高粱杆酒，有全部支委和几个生产队长参加，一边喝一边聊。我说：“领导决定调我回去，我来这里后大家对我帮助很大，很感谢，对我有什么意见请提提。”他们提了些意见，但多是表扬，我说主要是提不足之处，好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改进，就这样有说有笑，高高兴兴，我向大家告了别，他们给我送了行。总之，我在十渡大队下放劳动只有四个月，但是收获很大，向广大群众学到了很多优良品质，学到了很多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学到了基层工作方法，也学到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，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。这些收获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，是用金钱买不到的。经过这次下放劳动，深深感到市委，县委采取的这项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和及时的，对我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起着指导的作用，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。

苏维斌：原区工业品公司工会主席